



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論文選譯

內 部 發 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出版說明

本書收集的是修正主義創始人，德國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伯恩施坦的五篇重要講演和論文。在這些文章中，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伯恩施坦關於社會主義及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等的修正主義觀點。譯文是按講演和論文發表時間先后排列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华書店（內部）發行

1959年12月出版

統一書號3002·57 售價（六）0.17元

目 录

一 社会主义經濟的萌芽.....	1
(譯自“經濟生活的各種形式”，1903—1904年在柏林的講演)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	6
(譯自“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年在柏林的講演)	
三 走向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	11
(譯自“社会民主主义要些什么”)	
四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維主义变种.....	13
(譯自“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1921年在柏林的講演)	
共产党宣言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形式——布尔什維主义的产生—— 布尔什維主义的先驅者，社会主义革命的空想家——馬克思主义 中的改良因素——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于經濟的成熟 ——布尔什維克想用暴力迫使經濟成熟——布尔什維克迷信暴力 的創造力量——托洛茨基坐在民族的背上練習騎馬——馬克思主 义提示意志的界限，布尔什維克則对这种界限不予重視——拙劣 的試驗——对沙皇專制主义的模仿——布尔什維主义的血債。	
五 社会主义今后将会如何实现.....	31
(譯自“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	
馬克思所認識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和 世界大战前夕的工人阶级——用法律和組織达到改善的目的—— 企业家的組織——战争中的国民經濟——所謂战时社会主义—— 德国的革命和德国国民經濟的困境——在生存斗争中的新共和国 ——布尔什維主义引誘者的突击麻痹了共和国的創造力——选举 的结果迫使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虽然这样，社会 主义的实现还是可能的——財政困难迫使社会化通过各种不同的 道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化——不是大的飞跃而是許多 有重要意义的过渡——对願望的节制可以保証得到所希望的。	

一 社会主义經濟的萌芽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經濟呢？它是什么样子？它要用一个什么名字？我們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我們龐大的、由經濟上彼此相当不相关联的地区組成的国家組織，正在逐步地越来越变成各个部分不是彼此隔絕、而是由无数的網道紧密聯絡起来的机体。在这个机体之中，我們看到卡特尔和辛迪加是使整个工人大軍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体經濟的联合，是对机体的生存行使巨大的权力的警察。为誰的利益行使这个权力呢？不是为創造性地从事生产的那些人，甚至不是为領導生产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只能得到或大或小的管理奖金。利潤乃是为手里握有某些股票，一种或几种股份的人而設的。是的，你們相信人类对这样的事会永远忍耐下去么？你們相信这种情况是与一个对它本身和它的行动有覺悟的人类相配称的嗎？这种情况使得很大一部分人从年青的时候起就因阶级地位关系除了借他人的劳动获取收益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你們回想一下古羅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統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結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須逐渐地交出它的統治。

这件事應該怎样产生呢，这是很容易描述的。我們看到，资本主义的企业是怎样联合为辛迪加和卡特尔的，怎样合并为托拉斯的。对于一定的生产部門，整个生产日益集中在一个大的资本主义的組合手中。凡是条件已經成熟的地方，只

要一个步骤，就是将这种資本主义的組合征用，这样—来联合起来的生产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不是再为股东进行，而是为整体，为社会繼續进行。为社会生产我們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一方面，这个經濟形式本身向着公有化前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成長，城市的任务也增加了。过去，当城市差不多只是由农庄和若干手工业者的街道构成的时候，那时城市領導的任务是很少的。对清潔的要求还不高，土地价值很小，当时对城市來說几乎說不上有什么管理任务。而今天，这种情形則有了根本的改变。各种不同方面的管理任务不断增加。在現代化的城市里，隨着城市的發展也出現了土地高利貸和土地投机，因为城市的發展就是土地价值的增加。什么是土地价值呢？只有城市居民必須向城市土地所有者繳納的那个資本化了的利息和稅。这种利息和稅成了一种与中古时代曾統治着的那些封建权利相同的封建权利。从前人民为封建主服过劳役，現在城市居民須向土地所有者繳納貢稅，一般的觉悟是愈来愈反对这个。把这件事委之于經濟力量自由活动是不行的，因为經驗表明，在經濟力量自由活动的情况下，租金就会經常地上升，居住就会越来越貴，土地就会越来越多地为土地所有者生利。市政机关終于必須阻止这种活动，而要能徹底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土地完全轉为总体所有。

但是就連这个也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交通政策，还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住宅政策，后者須注意到建造充分数量和合乎質量的住宅并且提供建筑和維持費用。因为人們对住宅事业的文化生活和衛生設施的要求提高了并且还远未得到滿足。这种情形和类似的情形使得有必要推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市政政策并且如果这个政策要認真和有效地貫徹，那末它就不可也不会出現在那些地方，即像在我們

普魯士一样，土地所有者根据法律在市的代議机关里成为多数，而是出現在多数市民根据民主权利在市政管理上也起决定作用的那些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为执行一种符合目前要求的市政政策所必需的毅力才能得到發展。

城市地方承担的任务愈多，它本身直接或間接使用的工人也愈多，这就有必要制定一个适当的市政工人政策，这将进一步推动城市地方民主化并且进一步推动去把作为总体的經營者的城市地方为总体的利益而組織起来。这就是市政的社会主义。这样，在我們的城市地方，在这种情况和力求上升的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不断加强的压力下，新的社会主义的萌芽就繼續不断地發展。

但是今天國家的任务也比过去完全不同而且更多了。它須将交通一部分不断加强监督和調整，一部分將經營管理交通工具的事情拿到自己手里。私人产业或私人权利阻碍分枝極多極广的經濟生活从而給經濟生活带来損害，因此国家必須为了社会的利益对这种阻碍加以干涉，变私人企业为公共企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总之，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新萌芽也在發展，它們最后将成为一种新的經濟形式，一种不是乡村地方沒有内部联系，不是國內或国际的資本家組合控制了生产的經濟形式，而是一种国家和城市地方用組織上的联系和分工，亲自或通过由它們設置和監督的公共机构从总体利益的觀点出發逐漸地去处理經濟任务的經濟形式。

当行会被破坏，当旧的家庭經濟公社解体的时候，人們相信，这些小范围經營的經濟形式的破坏将会使产品以最便宜的价格和最好的形式到达公众手里。但是自由競爭把对它的期望只实现了一半。在消費者与生产者之間挤入了越来越多的作为中間商人的階層。中間商的陣地越来越大，願意从事

中間商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产品对于消費者就貴了。公众也漸漸地对此有所反抗并寻找产品供应的新形式。受产品昂貴影响最厉害的工人阶级首先發动了。工人們在他們的工人消費协会里創立了排除中間商的組織，这些組織的規模在我們这里目前还很小，但是英國的例子表明，只要这些組織能够把若干消費用品的生产拿到自己手里来，它們就能發展成很大的規模。它們成为城市地方本身以消費用品供应地方居民的基本形式。倘使我們的城市地方有一天想自己來組織消費，那末它只須要在已有工人消費协会并且力量很强的地方把这些协会接收过来并扩充其业务。那差不多只是規模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質上的改变。形式在工人消費协会里就已經形成了。我們因此又有一个新的經濟制度的萌芽。所以，由于我們現代化生活所引起，一方面漸漸产生了需要和推动力，另一方面漸漸产生了一个新的經濟制度的形式和組織，这种新的經濟制度在一切方面都把大众的巨大的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之上，因此我們称这种經濟制度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至于它最后将組成何种样的形式，我們不知道，并且今天也不須知道。我們只要看見这个萌芽，看見这个經濟怎样成長为这种制度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推動它，这就够了。

我們曾經看到，人类經濟是怎样从原始的最簡單的形式逐步發展起来的，而这种發展有时又是怎样中断的。我們看到旧文化因不能繼續發展自己以致灭亡，因为統治者精神方面比体力方面还要柔弱，被統治者因奴化而萎縮。現在我們看見了一个新的經濟形式正在开始形成。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奴隶經濟了，而是以一个在数目上异常龐大、精神上百折不撓的工人阶级作为經濟的基础。对于已經觉悟到要求自決的工人

們，他們作為生產者雖然仍是从屬的，但是作為公民則是獨立的，并且由於階級地位的推動；越來越多地要求公民權利，凡是对他們還扣留不與的權利他們也一定會爭到手。保證他們能够做到这点的是：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地擴大，他們的社會意義日見增長，而最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的中心，在巨大的經濟往來的要點上他們是最為強大的。從所有這些事實看來，我們不但確信，人類不會停留在目前的經濟階段上（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人類這一次也不會向後走，而是要過渡到經濟和文化的一個新的，同時又是較高的形式。事情的發展所以將會這樣，也是因為現代工人階級精神上的發展所造成，是根據這樣的事實：工人階級在任何方面都在完善起來，不但它的數量在增長，不但它的經濟意義在提高，而且它的精神意義也在擴大，它正非常努力地來增加它的知識和理解。這些演講是從這種感覺出發組織起來的，如果這些演講能夠對工人階級精神方面的提高（有許多力量在對這種提高發生作用）有所幫助的話，那末它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經濟生活的各種形
式”。1903—1904年在柏林給工人所作
的講演。）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

敬爱的各位听众，目前要求社会化的呼声喊得很响亮。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化就是代替公有化的一个名詞。人們不断要求社会化，“为什么現在不立刻实行社会化”这一急迫的問題也表現了这种要求，但是，在要求社会化的这一呼声中包含着一些对公有化的直接作用力的不可思議的信仰和对巨大困难，特別是在政治領域內遇到的困难的輕視，这些困难在目前的情况下正是前进的障碍。这种迫不及待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这种情緒，但是，亲爱的上帝，一件这样大的事情，畢竟不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来完成。（热烈地高呼很对！）今天我們的工业陷于停頓，它正在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并且还面临着許多我們根本无法估量的困难，因为我們完全不知道；外国将要把那些条件加到我們德国身上，这时、如果設想，只要我們宣布工业公有化，即社会化任何事情就会得到有利于工人或集体的改善，这就是——恕我用一个粗暴的名詞——相信不可思議的奇迹。（鼓掌）

国有化或地方公有化是公有化的典型。它们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最大可能使大家幸福才是目的。它在經濟、生产、貿易和交通各方面将通过極端經濟措施而得到保証。如果社会化了，人們就要不斷質問：我們就这样前进以使我們的經濟达到更高的發展水平呢还是我們暫时因为形

勢的压迫不能前进而向后退呢？这种急躁情緒是我所理解的，我把它当作推动力，但是我們不能向自己隐瞒，今天为的是什么，下的是什么賭注。公有化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把生产和經濟生活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置于一个远远比过去更为有力的监督之下。公有化，使經濟归社会領導，并使它为社会服务，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道路，而不是仅有一条固定的道路来实现公有化。可是目前在我們德国的經濟生活中（农业除外），有整整300万个种类不同的企业，其中半数以上是小企业，个体企业或者不值一提的可能只有一个伙計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我們算它是 $\frac{2}{3}$ ，那末还剩下100万个各式各样的中型和大型以及最大型生产企业。你們相信，如果在这些企业中到处都放上一些国家公务人員来代替企业家，这些企业会得到改善嗎？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实际上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澈底地、系統地来完成的进程。人們應該研究，哪一种宜于首先很好地、尽快而最有效地为社会所接受，哪一种宜于并且應該留在私人手里，以便使人民賴以生活的經濟繼續下去，使它不致陷于停頓。我們的人民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指靠工作来維持生活。

敬爱的各位听众：因为在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大体上來說还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在战后的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貧穷的国家，所以它必須采取貧穷国家所执行的經濟政策，并且因为这个国家为了能够进行經營，而不得不輸入价值数十亿的原料和部分食品，所以它必須输出产品。因为产品終归只能以产品来偿付。黃金很快就要枯竭，而我們所印的紙条条在外国沒有人接受。（热烈喝采）

第二任首相卡普利維伯爵当时（90年代初）在指出德国不能生产它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和不能自己生产全部粮食时曾說

过这样的话，我們必須輸出貨物或者輸出人。而輸出人換句話說就是移民。我耽心，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人要被迫移民。（呼聲：往哪里去？）但是，我們不願意人为地將移民的人數擴大。已經有人向我提出問題：往哪里去。今天我們在世界上所受到的待遇和在那個可怕的、萬惡的戰爭以前完全不同。我們遭受到憎恨，這種憎恨在敵對的立法中明顯地表現出來。這就使得移民比戰前困難得多。這樣我們的工人的處境只能夠像弗萊利格拉所說的：“她尋找別人的爐灶，靜靜地坐在灰里。”因此，我們今天不能再人为地將移民的人數擴大。我們應該設法使必須到外國去的工人數目保持最低限度。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慎重地、系統化地進行社會化以及為什麼我們要讓還沒有社會化的工業在這個期間存在和工作下去的一個原因。（熱烈喝采）我再重複一遍：社會化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道路。它可以通过將一定的工業直接接收的辦法，使它們成為邦營企業也好，地方公營企業也好，國營企業也好。但是，社會化也可以這樣進行，即借助各種法律和規定使群眾越來越多地參預監督經濟生活。今天已經這樣做了。就是工廠法當年也被資本家看作是侵犯他們尊嚴的東西。他們想作他們家里的主人。在我們這裡，俾斯麥也曾經發表過和英國最早一批廠主相類似的意見。他也希望這個法律不要進到工廠里去。但是它仍舊進到工廠里去了，它為了群眾的利益和幸福，為了社會進步的福利進到工廠里去了。它還可以繼續不斷地一步步地擴展。各邦、國家和群眾都可以逐漸參加到暫時還保留在資本家手中的企業里去；參加到這些企業的收益和定價方面，以杜絕一定會造成物價高漲的壟斷。（很好）。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它還將繼續發展下去。用這種方法，邦和群眾就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利並能夠越來越多

地参与生产。

2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說过这样一句話，今天我还要重复一遍：一个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鼓掌） 因为在这里抓住了更多的群众。至于国家多有或少有几个企业（而且也許还按資本主义方式去經營这些企业）算得了什么？

工人阶级要求国家民主化、企业民主化和所有的行政管理民主化，并要求将民主化扩大到一切部門，扩大到教育事業、体育、艺术和交通等方面。工人运动由于它的全部本質和下列事實而向各个方面推进，即在运动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在精神上也先进的分子，他們不滿足于得到物質方面的利益，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希望在精神方面也要得到实际自由。这种人可能还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多，但是，参加學習的、受过教育的數目和有崇高精神的工人数目正在不断增加。今天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工人表現了他們有能力从自己的阶级中出来担任国家或各邦的重要职位。我是最不会奉承工人的。在工人大会里我也对他們表示我的意見，而且比在这里更能够暢所欲言。但是我要說：工人运动創造了一个偉大的事业，因为它把什么是阶级觉悟向工人解釋清楚并使他們牢牢記住，这种阶级觉悟是許多資產阶级和你們当中的許多人所咒罵的和討厭的，但是这些人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因为具有真正阶级觉悟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这一偉大革命能够在我們目睹的一切动荡中相当平靜地，我想說合法地进行，这应当归功于我們有这样的工人阶级。

两星期以前在柏林这里举行了一次經濟會議，在会上我对資本家說：你們常常咒罵工人运动或者为它而生气，可是如果你们現在看到革命，你们就要說：什么是柏林那个可怜的

事件啊？什么是示威啊？原来它几乎没有触动任何人一根头髮。固然在这里或那里也發生过越軌行动，但是整个說来，这个运动是平靜地、合法地进行的。原因何在？因为我們在革命以前有过一次工人运动，它把工人組織起来了，它在一切可能的学校里对工人进行政治上的和工会方面的訓練，使他們能够明了和掌握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而不是像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懂的工人們所能做出的那样盲目亂打一陣。

（譯自伯恩施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1918年12月28日在柏林“音乐堂”大厅
所作的講演。）

三 走向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

但是这种社会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只有在产品的生产与銷售不再在資本家或其代理人的領導下为互相競爭的資本家的利潤服务，而是在总体的代理人的領導下有計劃地为总体的利益服务时才能成为事实。換句話說，就是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这种社会制度才能产生。而走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就是使生产公有化，不过换一个名詞罢了，就是总体通过它的机构——国，邦，地方——逐步地将生产資料收归己有，将生产置于它的領導之下。

这当然是一件巨大的任务，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工作。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仅在工业方面（即使将在 51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不算在内，虽然这些中小企业的总人数也在 300 万以上），就超过 20 万个企业單位，这些企业單位的工人加在一起就超过 500 万。它們在規模和种类、产品性質以及关于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常常極为不同，它們是經濟力的極其多种多样的游戏，要把它們一下子宣布变为国家財产，那将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官僚主义，那时，半数生产（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都将停頓起来。像通过两个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沒有想到这样无意謂的举动。

社会民主党知道，人們在某种条件下能够在短時間里推

翻一个政府，但是不能同时将数百年来在發展中成長起来的經濟制度在它的所有的部門中改革掉。社会民主党知道，不是所有的生产部門都成熟和适于用同样的方式改变成社会的企业。因此它决定在那些已給国家創造了最好的条件，使它可以成功地經營的地方开始全面地实行社会化并从那里起有系統地工作下去。它因此也不是那样糊塗，來規定办法或頒布法令，为社会化尚未抓住的商务活动带来危險并給私人經營者繼續經營他們的业务的热情潑上冷水。在为自由經濟保留的广大区域里，經營者（无论是否厂主或商人）應該和过去一样安全地从事他的业务并保有按照需要發展他的企业的可能性。

有人说社会民主党只承認体力劳动，也許还承認技术員和會計員的工作，說它不尊重企业领导的重要性，或者不了解每一个企业随时要增加或扩充它的营业資本这一事实，这种見解是完全錯誤的。社会民主党对私人企业主的必要性完全理解并且当这些必要性須要与工人的要求——足敷生活的工資和保护他們不从事过度劳动，不受專橫之苦——协调的时候，根据可能考慮这些必要性。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主义
要些什么。”）

四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变种

共产党宣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者，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中的改良因素。——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于经济的成熟。——布尔什维克想用暴力迫使经济成熟。——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的创造力量。——托洛茨基坐在民族的背上练习骑马。——马克思主义提示意志的界限，布尔什维克则对这种界限不予重视。——拙劣的试验。——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模仿。——布尔什维主义的血债。

什么是我們所知道的布尔什维主义那个理論的基本思想呢？它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中在論及工业資本家的产生的第25章^①第6节中，描写了所謂資本“原始积累”即資本原始的构成的各种方法。与資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謂資本的构成是由于“儲蓄”或节约的說法相反，馬克思指出，資本完全是通过別的方法形成的，关于資本的这种真正原始的积累方法他写道：

“在十七世紀末的英國，它們被系統地概括在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中。这些方

① 应为“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第6节。——譯者注

法一部分是依靠極端殘忍的暴力的，例如殖民制度。但它們全都利用國家權力，利用集中而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溫室式地促進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並縮短其過渡時間。暴力是每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種經濟的力量。”

這一段引文中的最後兩句話，在當代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在其理論知識直接來自馬克思的各個政黨中，曾經起了特殊的作用。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米爾·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是他們的一位領袖，同馬克思要好的儒勒蓋德是他們的另一位領袖），用教條主義的解釋來宣傳這兩句話，借以證明一切社會主義的活動都必須用革命暴力來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但是應當指出：馬克思在這裡只不過簡單地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而並沒有提出直接運用的公式（注）。

然而，自稱為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一派，從對一個歷史事實的這種確認中作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政治必須遵守的一條準則：為了建立新社會，我們必須使用暴力，別的路是行不通的，我們的整個思想和願望都必須針對着奪取政權這件事。這是一種當然能以“共產黨宣言”中某些地方為依據的見解。例如在那裡，末尾談到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地方說：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無產階級變成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

(注) 拉法格對馬克思的說法所作的這種解釋，馬克思究竟怎樣不同意，可以從他在1882年11月11日給弗·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在那裡，馬克思給他的朋友寫道，拉法格實際上是俄國人巴枯寧的學生，並憤怒地宣稱：“朗格是最後的蒲魯東主義者，而拉法格則是最後的巴枯寧主義者！*Que le diable les emporte !*”

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然后列举了一系列与以往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某些措施相符合的措施。此外，上述思想方式的拥护者援引了卡尔·马克思论及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的一封信中的某个地方。在那里，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除了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这个句子也被布尔什维克（人们这样把这个字用到德文来）教条主义地解释了。这个今天作为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来领导第三国际（或共产主义国际）的党，从前也自称为多数党。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互相争论中，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要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的纲领（“最低限度纲领”）来进行斗争，就像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制定的一个有马克思为他们所作的序言的纲领，另一派则主张必须最高限度地提出要求，并把它们作为照耀运动的一盏灯塔经常高举着。在这两派中，后者正是布尔什维克派，而前一派则被称孟什维克派或孟什维克党——这个称呼是或多或少适合这个词的概念的，一方面是指所提要求的高低而言，另

一方面則指拥护者的多少而言。这个爭論大部分成了对馬克思的言論所作的經院式的玩意，其中一方不顧这样的事实，即馬克思的全部学說主要的是發展學說，而馬克思本人在若干年中也經歷了一个發展时期。恩格斯曾一再承認，在他們活動的初期，对于發展的速度和进程，他和馬克思曾犯了許多重要的錯誤。是否馬克思学說本身因此就完了呢？当然不是。馬克思主义之所以偉大、持久、超出一切个别应用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馬克思主义在社会發展学說的主要思想上，在生产方式有一定影响的理論上，給了社会的發展学說一个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馬克思曾将他学說中有系統的發展思想再度非常肯定地表达出来。在他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的序言中就是这样，在1866年“資本論”的序言中也是这样。馬克思在1866年“資本論”的序言中說——这对于他的世界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甚至現代的統治阶级也漸漸地懂得，現在的社会“不是坚固的水晶石”，而是“一个可以轉化的并且是經常在轉化中的机构。”

这里表明了基本观念的不同，它把我們今天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維克党和它的西欧的模仿者区别开来。

布尔什維克党是从俄国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学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恰巧可以称为这个学派本来的創立者的三个人物——已故的格奧尔基·普列汉諾夫、刚去世的維拉·查苏利奇和尚在世上的巴維尔·阿克雪里罗得——是布尔什維克的敌人，或者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反对布尔什維克的人。我在上面曾說过，布尔什維克是極其經院式地援引馬克思的話的，我这里还要加上一点，就是我把那种精神倾向或精神活动看作經院哲学，它們常常为已經确定的科学定理用强制的說明艺术推断地提出証据，而归纳的因素，对

事实的审查，如果不是完全置諸不論，就是非常失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發展學說的主要特點，恰好是這個學說着重強調社會一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事實即與生產關係的緊密的、有機的（人們在這裡可以極有理由的說）聯繫。從這個觀點出發，“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他們對他們那個時代來說是這樣革命地思考，這樣毫無顧忌地贊同那時工人運動中進步的一翼的共產主義思想），當他們制定他們的理論時，就已經表示反對當時的急進社會主義者，這些急進社會主義者被認為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而事實上他們只要求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空想主義者的稱號。德國共產主義者威廉·魏特林就屬於這一人類，他確實有才能，但他缺乏科學知識，他是1842年出版的“和諧與自由的保障”一書的作者，馬克思很重視這本書，但這並沒有妨礙馬克思後來严厉地反對他，因為他誇大地鼓吹急進主義，弄得工人們暈頭轉向。這點之所以值得提出，是因為魏特林的思想與目前布爾什維克的信徒用以向工人們說教的許多口號有類似之處。

1846年年底至1847年年初的冬天，魏特林來到布魯塞爾，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住在那里，從事他們偉大理論的創造並且進行筆戰。當魏特林有一次訪問馬克思的時候，俄國作家安年柯夫也在座，這位作家在他的回憶錄中描寫馬克思和魏特林的劇烈衝突。出自工人階級的魏特林，向馬克思主要地（像根本地）為他的理論的感覺方面辯解，值得注意的是，據安年柯夫說，馬克思是何等強硬地對魏特林強調具體而科學的思想的必要性，他曾用拳頭擊着桌子憤怒地叫道，“不學無術，還從不曾對人有過好處！”

過了四年，在革命以後，馬克思和他的早年战友發生了衝突，他們用和魏特林相似的方法主張感覺和意志。這是卡

尔·沙佩尔和奥·維利希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派。这种矛盾重演于1870至1872年間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斗争中，对巴枯宁和更甚地是对——我不能說是“学生”，甚至說不上是“同志”，虽然他对巴枯宁發生过重大的影响，而是——巴枯宁暫时的共同奋斗者，那个大学生涅恰也夫，一个應該称之为布尔什維主义的先驅者。他的思想是在主要地由恩格斯并得到馬克思贊同所写的“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一文里予以說明和批判的。这篇文章特別是异常尖銳地反对巴枯宁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涅恰也夫則把这种浪漫主义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成了一种Rinaldo Rinaldini ①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巴枯宁特別贊美了俄国的强盜并且贊美到这种程度，以致宣布說，如果要革命，就必须将牢门打开。这是对那些不顧理論和道德等等而簡直与有秩序的社会相对立的坏分子的一种空想。駁斥这些幻想以及強調向社会主义發展与一般經濟的發展的联系即最后与生产方式的联系，是馬克思学說中的主导思想。因此已从“資本論”序言中所引的那个句子，——即現在的社会，自由主义經濟的社会，“不是坚固的水晶石，而是一个可以轉化的，經常处于轉化过程中的机构”——比某些其他常引証的句子要重要得多。在“資本論”的另一个地方，在談到工厂立法和描述十小时工作日对于郎卡郡棉紡工人的作用时馬克思說：

“然而这个原則(指以法律限制工作时间——伯恩施坦)随着它在大工业部門中的胜利而胜利了，大工业部門是現代生产方式特有的产物。1853到1860年，与工厂工人生理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再生結合在一起的大工业部門

① 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沃尔皮烏斯的一本有名的强盗小說。——
譯者注

的惊人發展是昭然若揭的。”

与上面所引証的句子相联系，在“資本論”的序言里馬克思說：

“在英國變革的过程（社會的轉化過程）已經是十分明显的了。这个過程發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一定会發展到大陸上去。它在那里将是采取較為殘忍或較為仁柔的形態，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不管有沒有較高超的动机，現今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就会使它們除去一切阻碍工人階級發展而可以由法律控制的障碍。所以，我也在这一卷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細述英國工厂立法的历史、內容和結果。一个民族應該而且可以向別的民族學習。”

我敢說，按着思想過程來說，这点也表明馬克思革命理論中的一个剧烈的改良混合物。馬克思在精神的發展方面越是前进，那末在他那里經濟發展程度与政治和法律干涉的可能性之間联系的思想也格外表示得清楚。1875年，他在論当时統一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綱領草案的一封信中說：

“法律永远不会高过經濟形态以及受此限制的社會文化發展”。

在布尔什維主义那里，——我再強調一次，在它的理論里！——这一切都被置之不顧或規避了。布尔什維主义或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依据宣言中那些簡潔而尖銳的、但属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言論，在那些言論中，他們对“à la bourgeoisie”（資产者）說点使他們吃惊的話感觉得有兴趣。布尔什維主义或是对于馬克思較晚的言論斷章取义地給予一种愚蠢的和最粗糙的解釋。在說明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趨向的“資本論”第一卷倒数第二章中，馬克思这样說：

“生产資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即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伯恩施坦)与它們的資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末日到了。剥夺者被剥夺。”

因此如果發展本身与資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那时剥夺者——馬克思称資本家为“剥夺者”因为在競爭中大資本家剥夺小資本家——就要被剥夺了。从这一句描写历史远景的句子中，布尔什維克得出了一句格言：“打刦打刦者！”而工人们也就按照字面接收下来并且極为粗野地使用起来了。企业家簡直不是被当作經濟上的剥夺者而被当作道义上的窃犯、小偷来看待。这是直接与馬克思相反的，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序言中，在提到書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不是很好地脫身，把他們描繪得不是很好看的时候，明确地說：

“可是，这里講到的是一些体现着各个經濟范畴的人。我的观点是在于我把经济社会形态的發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按照我的观点，比之按照任何其他观点，都更少能認為个人应对他在社会意义上說始終是其产物的那些条件負責，哪怕这个人在主觀上怎样超出了这些条件。”

我說，无论在哪一点上，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在这些地方都把馬克思的学說变得粗糙了，也可以說：变得野蛮了。作为生产推动力的企业家的历史的、到經濟發展的一定程度所必要的作用，在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中消失不見了——这点又与馬克思相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这本書当然很少人讀到)最后几章中的一章——第24章——关于收入的来源中分析說，剩余劳动根本必須作为劳动者超过給与他的需要的限度的劳动永远留下来，下面接上所引証的句子：

“這是資本的一個文明方面，就是它用一種方法和在某些條件之下強迫剩餘勞動，這些條件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關係和為一個較高的新生創造因素比在從前奴隸制和農奴制的形式下更為有利”。

馬克思再度指出，資本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雖然他平時猛烈攻擊資本）、推動的、他特別說是文明的作用。

對於這一切並由此對於經濟政策產生的結果，布尔什維克都漠不关心，他們把暴力看作萬能者。在布尔什維克的領導人中，人們可以看到更多——比在列寧、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其他人那里的還多——把萬能的不可思議的力量都簡單地歸功於暴力的句子。人們只要有了暴力，那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操縱發展！這裡我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馬克思在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說（這當然也是重要的）：

“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們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可以讀到：

“固然，一個社會即令它已經發現了自己運動的自然法則——而本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現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它也還是既不能跳過自然的發展階段，也不能用法令來廢止這些階段。但它能夠減少和緩和生育時的痛苦。”

馬克思是這樣寫的。現在我們再看一下布哈林的著作，“共產黨綱領”（布尔什維克）。他在這個綱領中宣稱，在俄國，

这个整个來說尚不很發達的国家里，馬上就会实现工人阶级專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目前必然要發生的事情，他說：“工人阶级專政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扼杀資产阶级和地主”，并接着說：

“工人政权只能从摧毁了資产阶级国家和資产阶级政权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長起来。”

而这是在一个显然还根本未曾有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里写的！此外就是說，專政必須是“热心”的，这个字眼像在这篇文字里一样，在布尔什維主义的文献中屢見不鮮并且表示为殘暴的意义。在几頁以后可以讀到：

“現在我們看到，对于革命的敌人侵犯其任何自由是必要的。在革命中就不能給人民和革命的敌人以自由。”

但是不仅一切資产阶级政党毫无区别地都被看作革命的敌人，而且与布尔什維克站在不同立場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被看成是革命的敌人。这是人們所能想像到的極端的恐怖主义。在托洛茨基的“苏維埃政权和国际帝国主义”一文中——这是托洛茨基对未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所作的講演——，可以讀到：

“而政治家站在中間，他們時而向左轉，時而向右轉。这就是孟什維克和站在右边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他們要說：‘权力應該平分。’”

他对工人們說了这些話啊！他接着說下去：

“但是，同志們，政权并不是一片面包，可以切成兩塊，再分成四塊。”

这是什么比喻和怎样地否認历史啊！下面这几句話表明其目的何在。托洛茨基說：

“政权是某一个阶级借助它来巩固自己的統治的工

具。这个工具或者为工人阶级服务或者被用来反对工人阶级。”

这样一来，各民族生活中的发展被抹煞了，从一个社会状态到另外一个相反的社会状态就没有过渡，没有发展，而是只有通过政权来使其转折。话是这样说下去的：

“这里没有选择。只要存在着两个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与无产阶级一起的极端贫困的农民——，只要这两个敌人互相斗争，他们当然就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武器。不可能想像，一尊大炮同时为这一个军队又为另一个军队服务。”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个论据的性质，必须记着，这个论点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的以及它要印入工人脑子里的那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怎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政治问题对人们用这样简单幼稚的对照来阐述过。即使当德国经济方面远超过1918年的俄国时——文化的发达更不必谈了——，他们仍表示由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暂时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是合适的。

按照上面这个推定的典范，这个适合于最天真和不开化的人民理解力的推定的典范（这些推定贯穿在整个作为宣传文字而翻译成各国文字的演说中，并和关于世界大战原因及其影响的妙论相交替），托洛茨基谈到由布尔什维克行使政权并且用下列的论据提出原谅他们的错误的要求：

“有一些人说：如果你们事先没有学过怎样行使政权，那你们为什么要政权？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手中没有木工的工具，那我们怎能学会木工手艺。为要学习治理一个国家，就必须将水准尺拿到手里，就必须将国家政权拿到手里。还从没有人坐在屋子里学会骑

馬的。为了要学騎馬，一定要給馬安上馬鞍并且坐到馬背上。很可能这匹馬要用后足直立起来并且多次地把我們摔下来。我們將爬起来，安上馬鞍，再騎，这样我們就能学会騎馬。”

如果这样一种試驗只涉及那些想學習騎馬——指的是治理——的人，那末我們可以說：好得很。但是不知道会引起什么結果，就施用强力用整个的国家作徹底的經濟試驗，并且这样想，这样虽然也許会走錯，但是不要紧，那就再来一次。就这样地对待一个大的民族，因而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飢餓、貧困或毁灭，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于社会改革者，革命者來說也有一个絕對命令啊！布尔什維克所依据的是偉大思想家的科学學說，凡是对他們不适用的地方就不加理睬，对此他們毫不关心，这是布尔什維克思路中的錯誤因素的特征。

因此我确信，我并沒有想到去怀疑布尔什維克的动机。像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一样，在这里当然也有很大数量的唯心主义者。但是其中一定也还有別样性質的人物。然而我把这个因素暂时摆开。在这里是談的理論，談到理解的方式和它怎样反应到布尔什維克的行动上。而那里恰好表現出来，他們是怎样严重地与偉大的匠人和思想家卡尔·馬克思的看法不符合啊！他們承認，他們的活动几乎完全不受社会制約。对他们來說，与若干大工业存在的同时在国家中也有一个无产阶级，它强大到足以在采用暴力时發揮积极作用，这也就足够了。但是平时在他們那些極其多种多样的文字中，那些強調无产阶级要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和經濟發展的成熟作为社会改造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者，无论他們是否馬克思主义者，都被輕蔑、嘲笑或甚至辱罵。例如一个应当說是真正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遭到輕蔑、嘲笑或辱罵，因为他批評列寧

和他的同志們的方法，他們就立刻称他为叛徒，至于說到鄙人，我就根本不想講了。

布尔什維主义几乎不知道在历史上有意志的界限。布尔什維克政治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做得好像对于革命維新者沒有同样的意志一样。在他們的絕大多数措施中与其說他們是馬克思主义的肖像，毋宁說是原始沙皇制度的肖像，他們只是馬克思主义的諷刺画罢了。因为馬克思理論的很重要的地方正就是他和恩格斯的学說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意志界限的有科学根据的学說。人們因此常称这种学說为宿命論的学說，但这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义远不是否認意志在历史上的意义或者沒有認識其必要性。曾經有过一个民主詩人，他已久被遺忘了，但是他的詩曾被傳誦一时和受到过一些人的贊賞，那就是死得很早的弗里德里希·馮·薩萊特，“俗人福音書”的作者。在他的“历史性的發展”一詩中，他歌唱在德国政治靜止的时代：

人們告訴我們：青年人怀着过度的热血

把狂热的創造冲动謝絕，

历史上只發展好的事，——

而你們說，当什么也不發生的时候就是历史！

馬克思完全承認这种觀點，它完完全全地符合馬克思的理論。但是人們所做的，也只能在已有的力量和發展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貫徹。

恩格斯曾在与杜林作斗争的文章中对于这个問題用了好几章宝贵的篇幅来加以論述，这些篇幅在今天又变得很重要了。其中一章特別地也击中了布尔什維克的方法；即將極端不同的东西按它們外表的特征而加以同等看待，并且对社会机构的历史制約性未予应有的注意。杜林曾談到整个希腊文

化賴以支持的希腊奴隶制并且将它和雇佣劳动制等同看待。恩格斯对于这件事答复說：

“如果說，雇佣奴役制不过是和奴隶制一样，那末也可以說，吃人制和雇佣奴役制一样，因为原始的不是奴隶制而是将被征服者吃掉。在历史上有好多次是單純的暴力反对經濟的發展——，或者是它和經濟發展一路走，那末他就完成了它的目的，或者它背着經濟發展走，那末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强力（特別是如果野蛮民族袭击文明民族的时候）就会毁灭整个的文明，或者在时代过程中經濟因素战胜了暴力，暴力就屈服了。”

現在，在尔什維克自己也不能再否認，他們也有这个經驗：凡是他們的暴力措施沒有考慮經濟制約的地方，就要遭到可怜的失敗。但是不幸地俄国人民对于这个經驗要付出无限牺牲作为代价。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偉大的地方，正是他們知道历史上意志的界限，它有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以后它又贊成革命。在恩格斯送給我的一篇馬克思遺稿中的一頁上——这是馬克思“共产党宣言”初稿中的一段（从未付印过）——有这么一句話，是馬克思对那些旧社会代表們（这些代表們宣布这个社会在它的基础上是不会被摧毁的）說的，他說：“你們是向后倒退的空想家！”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你們要阻碍發展，否認可以有一个超过你們的社会形式的其他社会形式，你們想斷言你們的社会形式是最后的；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宣布了，那末你們就是向后倒退的空想家！馬克思主义極其有力地強調意志的力量。在为采取行动所必須有的客观条件还缺少的情况下，它虽然不使工人采取行动，但是它也鼓舞他們；保护他們而不使他們气馁。为馬克思主义精神所影

响的工人运动就清楚地証明了这一点。“胜利是我們的！”是它的主导旋律，是感覺：“我們一定胜利！我們代表未来的事业！”无视于意志力量的界限是布尔什維克政策中不幸的失算。他們宣布在所采取的政策中許多經濟政策是錯誤的，这些錯誤是他們不得不一个跟着一个地承認的，布尔什維克的政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拙劣的試驗。相当多的文献會为此提出極多的証明。当然在布尔什維克的命令和計劃中可以找到許多动人心目的事情：有关教育和社会救濟的偉大計劃，有关組織生产和流通的偉大計劃，有关開發及利用地下蘊藏等等的偉大計劃。但是这样一些东西平常在社会主义文献中也找得到。18世紀和19世紀初叶社会主义空想家的文献中充滿了常常是偉大的思想和意义深長的规划。异常多的精神和智慧是在那里浪費了，許多东西在紙上想得非常出色：有些东西也逐漸地實現了，即使不能像空論的作者所想的那种范围和方式。

要实现布尔什維克的計劃，俄国今天相当缺乏一切先决条件，而且一部分是因为他們不重視精神方面的必要性而自己破坏了这些計劃的。所以在他們取得政权的時候，就鼓励工人儼然在实际上充当工厂的主人，但是他們并沒有承担經濟上的責任。結果怎样呢？厂主維持不下去，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就是不能独立地領導工厂，他們不是企业家，而且也不願意做。不仅如此。一部分工人——并且值得注意的：很大一部分正是熟練工人——同样地离开了工厂。在布尔什維克自己發表的文件中可以讀到，很大一部分熟練工人直接从工厂逃往乡間，为了在那里做个小手工业者，聊以为生而已。

在布尔什維克执政的四年过程中，俄国城市人口数目降低了四分之一以上，乡下的土地收益也日益下降。从形式上几已不复存在的无产阶级專政变成实际上奴役无产阶级，并

且从“扼杀”(是为与布哈林談的)資本主义的企业家变为养成官僚主义，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家和工业方面存在着这样多的官僚主义。

我不想对这件事作詳細的叙述。我并无意在背后說布尔什維克的坏話，我只研討布尔什維主义的缺点，因为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和方法是今天社会主义重要的爭論的問題。而我所概括地提出的事實，在布尔什維主义的文献中也已提出，这些事實在那里乃是热烈討論的对象，因为人們害怕这会产生不幸的后果。此外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布尔什維克制造了新的資本家并将外国的資本家拉到國內来。他們用尽了他們一切政治权力但就不是事情的主人。有一件事他們当然可以做到，那就是依仗着他們的近衛軍压迫箝制，为所欲为。恐怖政治并未削弱。但是亞洲的專制帝王和非洲的苏丹也都曾懂得这点。在俄国，痛苦不断在增長，对一切政治自由的压制繼續在进行。社会主义其他派别的報紙得不到發行，資本主义的報紙完全沒有，只有布尔什維主义的报刊才被容許。具有其他思想的人們也沒有集会的自由。自由的經濟創造力被扼杀了，而这种創造力对于俄国來說就是需要，如果俄国想多少恢復点元气的話。

这是旧沙皇專制政治的一段奇妙的重演。关于生在19世紀中叶并作为欧洲反动派的保护者的尼古拉一世曾經有过这样的傳說，說他当铁路发达，于是他也想有一条从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铁路时，他叫人拿来一張地圖，在圖上划了一条直線：这条铁路就是这样造法！这条路到現在还叫尼古拉铁路。当然建筑这条铁路的花費是極其巨大的。土壤情形、沼澤等等沙皇都沒有給以理会，他要怎样做，就得怎样做。在尼·烏里楊諾夫·列宁身上也有一点这样es的精神，其結果是造成

了不斷加剧的經濟的混亂。

無論哪里，凡是沒有正常的法律关系存在的地方，凡是法律不稳定的地方，凡是人們今天不知哪些法律明天有效的地方就要發生破壞。而我們今天所听到的关于俄国的事，关于成百万的人所遭受的那种可怕的飢荒，部分地也是这种試驗的結果。誠然，直接引起飢荒的是自然灾害——大旱灾。对于自然灾害人們迄今尚无能为力，但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甚至对付旱灾，人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凡是施足了肥料并且用心地耕作过的土地，它的抗旱能力就比缺少肥料和只是粗糙地耕作过的土地要强得多。凡是一个民族，特別是耕种土地的民族（俄国主要是农业国），凡是农民沒有确实把握能保有他們的土地，能将收成給自己留下的地方，农民自然就耕作得馬虎，就不給土地施加肥料。因为这种事实，例如过去一度是被称之为肥沃天堂的小亞細亞，正是在西面，在土耳其帕沙的專橫統治和土耳其任意征稅的制度及实物稅之下，大部分都变成砂地了。令人遺憾的是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沒有正确地認識到經濟規律，沒有正确地認識到經濟生活中的物質、精神或心理上的条件以及經濟分子在發展的一定阶段上的职能，而出現了可怕的后果。人們竟讓那些部分地曾經經營得極為合理并且曾提供大量的多余产品的大地产被分給农民。結果怎样呢？多余的产品不再有了。人們不能使制度和党对一切都負責。在革命中也會發生許多違反革命者本身意志的事情。但是为使不可避免的障碍尽可能減至最低限度，并尽可能快地办到与恢复經濟生活的需要相适应的状况，于是要求一切置身于法律状况基础（这个基础是1917年2月革命所奠定的）上的人來共同行动。至于人們在空想中引起相反的結果，这只能因为有了暴力，为的然后——像布哈林

所說的一一，如果整个資产阶级的国民經濟被“扼杀”了，可以从新开始。这样做的結果只能是造成这样的混乱。只有玩积木游戏的小孩子才能够这样做。而这样一种思想，即想能这样摆布有千百万人的人民的生存条件的思想，乃是皇帝的瘋狂，不管是出自一个戴皇冠的独裁者或是出自革命者。它在布尔什維克那里只能获得地盘，因为布尔什維克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种解釋得完全錯誤的、極端粗糙的馬克思主義。

对此还有下边的話要說：

批評布尔什維主义的人是很多的，显然地可以引証一些。为的不要引起別人指摘我偏頗，我就在这个地方对这件事丢开不談。只有一个著作我相信應該記住的。那就是尼·格非莫夫“論布尔什維主义的社会学”那部小作品(柏林自由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个俄国人，他曾在俄国，这个以前的沙俄帝国，经历过布尔什維克統治的最初几年，他指出布尔什維主义与沙皇俄国革命恐怖主义者的运动的内在联系，他說这个运动并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是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且在急进主义方面一个要超过一个的这种趋向，从俄国的政治状况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这种方法來到俄国的馬克思學說受到应当說是粗野的解释是很可能發生的。

实际上布尔什維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現象，这个可由在俄国長期統治着的关系来作解释，在那里，在一个絕對專制的政体之下，極端强制的压迫手段已成習慣。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絕非因此就有模仿的价值。它是思想上一个异常不幸的錯誤的毁灭作用的例子，它的表現是：相信野蛮暴力的全能，不認識社会存在的基本規律和輕視从野蛮中跨出来的人类社会在發展中的組織原則。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

五 社会主义今后将会如何实现

馬克思所認識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馬克思時代的无产阶级和世界大战前夕的工人阶级。——用法律和組織达到改善的目的。——企业家的組織。——戰爭中的国民經濟。——所謂战时社会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德国国民經濟的困境。——在生存斗争中的新共和国。——布尔什維主义引誘者的突击麻痹了共和国的創造力。——选举的结果迫使社会主义者和資产阶级政党联合。——虽然这样，社会主义的实现还是可能的。——財政困难迫使社会化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化。——不是大的飞跃而是許多有重要意义的过渡。——对願望的节制可以保証得到所希望的。

有人对本文作者重述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發言。但是我想不起曾說过这样毫无意义的話。事实上当时(在1898年春天)我在对說我在文章里几乎从未提到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这一指摘作答复时曾經說，我对一般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很少鉴賞力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对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承认这是个人的漠不关心，但是距离提出一个普遍可以采用的客观原理还很远。

但是，發言被这样地理解了，并且引起了許多爭吵。这是怎样造成的，在这里可以不作說明。但是，应当指出一点，就是

如果在不同于当时存在的情况之下，是不会有人对它加以責難的。因为在这里所說的与馬克思1871年在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內戰的宣言中所說的并无重大差別：

“工人阶级……并沒有想靠人民的决定来实现完滿的烏托邦。它知道，要謀得自己的解放，并从而达到现代社会由于自己的經濟發展而不可遏止地趋向着的更高的生活形式，它必須經過頑強的斗争，必須經過整整一系列把人和环境都完全改变了的历史过程……它只要去解放那些已經在崩潰着的資產階級社會里發展了的新社会因素就可以了。”

我用下面的話來对所引証的宣言作了一个补充：

我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社會运动，这就是說理解为社会的进步，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进步的政治和經濟的宣傳及組織。

要想造成一种印象，說馬克思的發言和我的陈述在意思上根本沒有重大区别，那是荒謬的。这种区别是不可爭辯地存在着的。区别就在于馬克思估計适当的新社会到来的速度和旧社会崩潰的速度比我估計得要快，并且在这个推測中用了另一种說法。但是，把这个运动和由它产生的斗争看作有决定意义的，并認為一切都是由运动来决定的思想，在他那里也是主調。

自从馬克思写了上面提到的文章，半个多世紀已經过去了，而現在可以提出質問，問他是否仍旧相信，旧社会的崩潰可以不經過这样長的时间。有一些人对此表示同意，无论如何，为了正确地估价馬克思的属于他生存时代的各种言論，这个問題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为了我們进行考察，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者在这里原顛地宣布，未

來的新社會只是“整整一系列把人和環境都完全改變了的歷史過程”的結果。

當馬克思寫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時候，歐洲社會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处在傾向于民主的自由主義的道路上。根據自由主義的精神修改了憲法，對報刊和結社權的束縛放鬆了或取消了，選舉國會的權利放寬了。在英國，自由貿易獲得了勝利，看來它還要從那裡通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勝利進軍。降低了稅率，締結了帶有最惠國待遇條文的貿易協定，這種協定是走向完全自由貿易的初步。所期待的世界和平時期自然是被德國的三個戰爭嚴重地破壞了，但是它們所引起的經濟生活的損失並不太明顯。資本主義生產經歷了經濟危機的時期而仍舊向上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增加了，國際貿易關係頻繁了，城市和工業中心擴展了，工商業企業擴大了，因而產業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了。在七十年代末當馬克思因病而不得不擱筆的時候自由主義的時期就停止了。保護關稅的反動浪潮流遍全世界，並且招致了帝國主義性質的殖民政策運動；大國間的關係惡化了，它們開始組織聯合，接着進入海陸軍軍備競賽的時期。但是，同時工人運動也有了新的高漲，社會主義的國際復活了，並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從參加國的數目上以及各國支部的內部力量上來看，都超過舊的國際。

在所有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達到現代化發展的國家的世界獲得了一個與馬克思所認識的和預見的不同的面貌。在評價各國人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內部安全的問題上，一切資產階級都有一種精神反應。他們不敢希望戰爭，並且也越來越不相信能維持永久和平。在俾斯麥的反社會民主黨特別法失敗以後，他們喪失了能够用暴力手段抑制社會民主党的信心，在日益

成長的工人运动面前他們看到自己不得不采取守勢。在德国，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对政府日益示弱，而政府不斷企圖用对工人在立法上讓步的方法使他們背叛社会民主党，但是沒有成功。讓步的主要部分，即那个由俾斯麦創始的劳动保險，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社會保險在物質方面給予工人的太少了，不能使他們滿足，但是在它的社會結果上却超过俾斯麦所希望的。它在保險机构（疾病互助会以及意外事件保險和殘廢保險諮詢委員會）里培养出一批工人阶级的官員，他們向工人阶级提供了充分的專門人材，这些專門人材以后将用于其他性質的組織和代表机构方面。劳資仲裁法庭通过工人陪审員的設施也起了这样的作用。依靠这些組織，于19世紀最后几十年以及在20世紀期間德国工人的工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扩展，終於在會員數目上几乎赶上英國的工会，而在內部組織完备和有效地匯集力量方面还要超过英國。工人阶级的政治組織和新聞业与工会平行發展，工人阶级在国会和地方議會中代表的人数也有了增加。一个合法的和自由的工人代表机关網遍布全国，不論重要性大小的城市都有一所由工人运动本身創設和維持的民众館或工会建筑物作为集合地点和工人書記处，在那里工人可以詢問和他們有关的各种社会法律，同时也通过这些事物的性質，使工人注意本阶级的政治和經濟的組織。此外，在这个新的世紀里工人消費合作社有了重大的發展和加強，它們的領導者和職員大大扩充了工人阶级官員的队伍。

但是，在另一方面企业家也并不是沒有組織的。在純粹的經濟範圍內創办了卡特尔和辛迪加，以便使競爭对物价的压迫不至于漫无止境；在許多情况下也可以在正發生或将要發生生产过剩的时候起調节生产的作用，这就是說，將生产暫時

有系統地加以限制。資本主義企业的另一更緊密的聯合形式是托辣斯式的聯合和大工业的合并或組成康采恩。为了与工会和其他工人联合組織相对抗，又創設了企业家或雇主协会，协会的数目最后發展到这样大，以致它們代表的企业所雇用的工人比在工会組織內的工人多得多。不管这些組織的数目和財力如何，它們抵抗工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它們認為，和有組織的工人簽訂工資合同比它們片面地为工人决定工資數目的办法来得聪明，这种情形越来越常見，在工会的統計中，工資运动以及其他运动不借助于罢工或同盟歇业而促使簽訂工資合同的情形大大地多于在企业中进行斗争來較量力量的情形。

所以，在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的社会面貌在若干方面基本上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示的不同。在“資本論”的“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篇中他是這樣說的：

“把这个轉变过程（企业的集中——伯恩施坦）的一切利益加以掠夺和壟斷的資本貴族的人数不断減少，同时貧困、压迫、退化和剝削的数量却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斷膨脹的、为資本主义生产過程的机构本身所訓練、联合和組織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長。”

虽然經濟企业集中的运动很强大，实际上資本貴族的数目还是不断增加。因而在普魯士（直到現在还没有这一类的國家統計）从1895年（創辦財產統計的那一年）起到1914年財产超过50万馬克的納稅者的数目，增加了50%多，而收入最多的阶层的人数增加得更多。但是有中等收入的阶层的人数也比全体居民人数增加得多，如果说工人阶级所处的状况还有許多应当改善的地方，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和社会法律方面的状况比馬克思写“資本論”中的那几行的时候要好得多了。广

大工人已經获得9小時工作制，少数工人的工作时间多于10小时。工人的工资收入照額面价值增加得相当多，照购买力來說增加得比較少些，但是仍然大大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保护职工条例、劳資仲裁法庭、工資合同或工資合同执行局、保險条例、公众和自由职工会設立的职业介紹所以及类似的設施与工人結社权相結合，就使得工人在企业家及其官員的面前法律地位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了提高。在工人世界的一定阶層里还存在着貧困，但是它并沒有增加。面包的谷类和烟酒等的消費量的增加以及按人口計算紡織品的消費量的增加等等情况就是这一点的标志；此外，死亡人数的減少以及結婚人数的大量增加也証明了这一点。随着結婚人数的增加，出生的人数当然就会繼續不斷地增加^①。因此像人口学專家所說的，这也是群众貧困减少的一个标志。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时代結婚数字的增加反駁了那些同样由社会主义者根据上升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現象所作的結論，他們認為资本主义会引起无产阶级家庭的完全离散。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不是自动地起了这些作用。它也不是完全沒有在这方面起作用，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上它創造了社会改良的經濟前提。但是从上面列举的事實可以看出，改良本身大部分是社会采取对策的成果，一方面是工人越来越强烈地通过政治压力来加以影响的立法和行政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工人的經濟組織直接行动的成果。但是，无论那些造成另外一种景象的力量是什么，在阶级組成和阶级的社会状况方面决不象馬克思所描繪的。如果为了不致于錯誤地理解馬克思，必須說明，他仅仅标志出一种趋势这一点

① 原文这里是减少（Abnahme），可能是印刷錯誤。——譯者

已經包含着現實可以引起一种与此不同的發展，那末这种不同的發展恰恰成了事實，并且因此已經預示出，今后的發展也不会按照那种式样。

此外，階級的發展在农村与在工商业和交通部門中不同，它完全朝着另一方向進行。在这里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吞并的情形使人完全感覺不到。相反地，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显示出更大的堅韌性。这些也是由于高度地利用社会对策而形成的，在这些对策中首先要提到組織極為完备的农业合作事业，充分利用它就可使中小农差不多可以得到以大量資本装备起来的大地主所掌握的一切技术上的优点。但是还有其他在生产本身存在着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在农业中的經營規模的發展和在工业中不同。現在只談其中最重要的情况；农业生产是一个基本上有組織地从事牲畜和植物培育的生产，而不是一个机械地为无生命的材料加工的生产。

战争在这一社會發展过程中基本上沒有把任何东西加以改变。它引起了不同的階級和性別在职业上的暫時混亂現象，妇女必須代替在战场上和后方以及作为占領区的衛戍部队的几百万男子填充工商业和交通等部門的空額；妇女的职业活动有了重大的扩展。工业被迫使它的生产适合战争的需要。为了制造大炮、軍火或炸藥扩大了原有的工厂，添建了新工厂，并且将以前制造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业品的工厂改建为生产这些軍用品的工厂。此外，运输線的切断造成了必要的消費限制，因此必須把粮食和其他重要日用品的貿易置于公众監督之下，为了这一目的而設立了各种日用必需品的總管理处来調節上述物品对于消费者的交付工作。这种交付必須按不同情况憑需要証来进行，日用必需品，如面包、肉类、牛奶等等实行配給制，商人只許憑配給証出售；对于上述商品也規

定出最高价格，商人不得向买主索取过高的价格。为了集中制造一定种类的工业品，在官厅的促进下創設了許多战时公司，这样可以节约生产中不必要的开支。

最后所描写的一切在当时被许多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来赞扬，并且从群众利益和最高经济性的历史观点来看，它也确实与调整生产和经营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共同之处。但是这样把资财集中起来并使生产和贸易从属于大整体的当前利益的做法在战争时期是常有的，如果要称它为社会主义的话，那末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和战争一样古老了。人们把它命名为战时社会主义，这在一点上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比战争的时间更长。它在过去没有这样过，并且这一次在德国也不是这种情形。而且在这里恰巧是最需要维持的东西被除得最快：那就是保护消费者不受重利盘剥。不错，这个保护法在战争末期就已经遭受严重地损害。规定许多商品的最高价格每次都成了一种信号，就是这些商品在橱窗里见不到了，而只能在背后（在“黑市”上）用重利盘剥的价格才能买到。在初期，疯狂的爱国主义热情还注意到使多数人自愿遵守为群众利益所需要的各種規定。但是当这种爱国主义热情冷淡下来的时候，重利盘剥和对这种行为的支持逐渐由于一部分人漫不经心和另一部分人没有原则性而占了上风，以至最后谁不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买主还能忍受的价格，谁不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养活自己，都要被当作傻子。当帝国随着它的军队的崩溃也崩溃了的时候，社会道德也严重地动摇了。

革命只能暂时阻止根深蒂固的灾害进一步蔓延。还在革命的当然敌人，不同程度的反动者惊魂未定的时候，由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府大规模地用金钱和其它宣传手段装备起来

的煽动者已竭尽全力来宣传苏维埃专政，以破坏年轻的共和国在人民中间的威信。提到作为战斗者参加过1919年在德国各地掀起的起义的多数人时可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要稍稍知道德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构成的人，都可以说，使德国服从一种苏维埃专政的号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促使农业占极大比重的俄国毁灭的东西在德国这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更不能忍受。有高度教养的机体在感觉对于它的机能的生活的暴力干涉方面比发展低下的机体敏锐得多。总之，作为社会主义者应该惋惜，人民代表委员会是政府形式的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并没有被更有效地利用；按事情本身来说这个政府同样是专政的政府，即使为尊敬它起见，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完全人道主义的、胸襟宽广的专政。例如，人们本来可以毫不遭受资产阶级抗议地，并且不使国民经济受到损害地借助于法令给国家规定比现在实际得到的多得多的对土地和矿藏的索取权，这些资产阶级非常高兴，因为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使这件事情危及它们的生存。但是，保护共和国不受正面来的暴力袭击成为迫切需要的。共和国肩负着由于关心到安插和遣散潮涌回国的几百万大军和东部及东北部不安定的问题，关心到战胜国的停战要求和许多内部的行政问题而产生的许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时，既然在总共和国的和成为共和国的各邦的权利的划分方面还存着广泛的意見分歧，并且还等着立宪国民会议来调整，共和国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以内讨论和制定这样一个侵犯各种权利的命令更是不可能的。

此外，共和国正是在关于私有财产变为公共财产的问题上不能自由地作出决定。从战胜国对战败的德国的整个态度看来应该估计到，于一定情况下这些国家可能在和约中保留

沒收公共財产的权利，而实际上在凡尔賽和約中也这样規定了。在談到財政問題那一节的第1条（第248条）中就規定那些在和約中所确定的协約国对德国的各项要求作为由“德国和德国各联邦一切財产价值和收入来源担保的第一債務”。

在召开1919年1月19日选举的国民會議的同时，完全由社会民主党人組成的人民代表委員会的政府宣告結束。通过了临时国家权力法以后，国民會議于1919年2月10日以379票中的277票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艾伯特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但是，第一任內閣是一个由7个社会民主党党员，3个中央党党员，3个民主党党员和一个亲民主党的无党派的內閣大臣所組成的联合內閣。从那时起在德国只有联合政府，就是說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和資產阶级的內閣大臣共同組成的，1920年6月到1921年7月那个时期是一个例外，那时的內閣純粹由資產阶级政党的代表組成。在今后几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会在国会获得多数，这不是不可思議的；但也不是非常可能的。相反地，在1920年6月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票数比起資產阶级的票数有了相对的减少。在选举国民會議时社会主义者得到13,827,000票，資產阶级得到16,574,000票，而現在的情形是社会主义者得到10,952,000票，資產阶级得到15,065,000票。社会主义者所得的票数由将近45.5%降到42.1%。

德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称为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党，是通过由成長起来的人民利用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选出来的人民代表而参加到政府当中来的，因此只要那种票数的比例存在，社会主义也只能靠立法实现用解释或說明的方法得到資產阶级政党中的进步分子贊同的那一部分。

这不一定是少的。人們常常想像實現了的社会主义的情況，但是沒有人可以对这一事實表示懷疑，即社会主义不是通過一個大飛躍就可以達到，而只能是一連串措施的結果，這些措施的實現有的需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有的需要經過較短的時間。科学社会主义的偉大創始者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也承認了這一點。沒有一項措施將會也沒有一項可以允許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不相適應。如果措施是這樣的話，那末它就要失敗，而要求這項措施或強迫實行這項措施的社会主义者要比資產階級政党遭受更大的損失。但是，那些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措施，即使は嚴重地侵犯了財產的權利和勢力範圍，仍然可以贏得非社会主义的各政党的一定的一翼。

因此，仔細地深入研究經濟和社會政策措施的可以預見的作用是有必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以及作為在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綱領”——為工人取得政權而制定了各項社会主义措施，今天，這些措施只能在這個條件下來考慮。這些要求的一部分已經由資產階級的運動和議會實現了；另一部分以一種趨於尖銳化的政治革命的形勢和早已不存在的簡單情況為前提，其他一部分隱藏着連它們的作者也沒有了解的，即使在那種簡單情況之下也不可能了解的問題。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要求：“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這項要求和我們時代的高度發展並廣泛分布的信貸制度比較起來簡直是兒戲。1848年的要求：“農民的抵押地宣布為國家所有”，也是這樣，而今天這項抵押品掌握在公家的或半公家的機關的手里，如儲蓄所和保險公司等等。“共产党宣言”中“廢除繼承權”的要求已被它的作者在1848年革命綱領中改為“限制繼

承权”，并且馬克思后来在反对巴枯宁分子的笔战中称它为聖西門主义者的妄想。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定的要求获得另一种面貌；因此，那个作为要求基础的思想必須以另外一种形式得到实际应用。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作中需要一种非常詳細的說明。它使得当时可以做到的进步要比过去所实现的显得小，但是，这些进步却比过去所实现的規模大得多。

自从通过战争所引起的政治变革在德国和多数其他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权利方面的要求以后，問題就在于，使經濟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得到更大的实际应用，能应用于我們今天用社会化这个綜合概念来表示的事业中。显然我們可用公有化这个德国字来代替这个概念，但是这两个字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公有化这个字几乎只使人想到，由私人企业或私人企业集团变为公共财产和为了公众經營的财产。但是，社会化这个概念的范围更广。它还可以应用于企业經營权和管理权的轉变。这对于当前的問題是相当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国有化还是企业或工业轉变为社会公共財产（撇开地方的企业部門不談）最常用的方式，至于这个国是叫作邦还是叫作国是无关紧要的。今天在德国对于国有化还有哪些經濟以外的顧慮，上面已經說明了；但是，也由于其他的原因，不仅資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就连社会主义者也对于說社会化可以普遍实行这件事抱着迟疑的态度。人們顧慮，在工业中会产生官僚主义，而且他們也不願意国家官員的人数无限制地增加。

这些顧慮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在人們常对資本主义生产加以指摘的問題当中有一点是无可爭辯的，并且也为馬克思坦白承認的：它是技术經濟进步的和节约材料与劳动的有力因素。官僚主义的生产能不能有同样的成就是值得怀疑

的，这不只是因为在官僚主义的生产中对于徹底改良技术的推动力不一样，而且也因为企业家失去了冒险的勇气。并不像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所想像的，以企业或工厂范围的大小来断定它们对于实现社会化是否已经成熟。马克思在他的被引证的主要著作的一章里说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但是这个点绝不是在所有生产部门里都是一样的。目前，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在今天问题完全在于寻找经济企业可以有资格社会化的客观特征和社会化最适当的方式。在这方面有许多已经实现了。从实践中来的城市建筑顾问霍尔屯曾经有六年做过梯森康采恩的经理，随后又当了大德·文特工厂的领导人，他在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社会化与复兴”里根据实际经验指出，应当从社会化的统一历史观点出发把企业加以分类，他并且提到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化避免官僚化的痛苦。在他看来准备社会化的生产部门是否已达到一定阶段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准则，在这一阶段上领导机关基本上只不过是一个机械地习惯履行职责的机构，并且可以判断出有根本意义的革新是否已经不会发生。按照该文作者的意见另一特征存在于产品的性质中，即产品是否为了满足一个巨大的并且在广大范围内均衡地存在着的需要，或者是否有一个不随兴趣和时尚为转移的销路。这样，为原料初步加工的工业和制造半成品的工业看起来比制造成品的工业更适于社会化，无论怎么说，原料加工工业和制造半成品的工业比制造成品的工业有更高度的集中，它们已成为大企业。纺织工业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在那里纺纱厂比织布厂和针织厂更高度地集中化了。

因此，为科学地有系统地分阶段社会化的顺序创造条件

不是不可能的，这种順序把問題从不加批判的試驗範圍內取出，并且避免失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化的各阶段。逐步实现社会化在許多方面都證明是必要的并且也是非常可能的。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它的目的总括起来就是取得特殊的經濟活动和普通的社会活动的成就以及改变在經濟方面工作的人們的法律关系。它的目的首先是在最能节约实际价值和人力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生产物質财富；其次是在工作程序和調整劳动代价方面尽量广泛地实行合作的原理，并提高在經濟中的职员和工人的法律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的立法上和行政上的一切徹底的措施都属于社会化的范畴。專家們都同意这一点。由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委員會組織的社会化委員会在他們的第一次報告中着重說明：这个委員会

“……知道，生产資料的公有化只有在較長時間的机体建設中才能完成，……”

并且在它証实了一切經濟改組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的重新繁榮及德国的經濟状况迫切要求恢复輸出工业和对外貿易以后，它又詳細地宣布了下面代表它的觀点的意見，

“……对于这些經濟部門來說，現在应当仍舊保持目前的組織。同样，工业的开工要求維持和扩大流通信贷和信貸銀行的完整的作用……”

为了利于食品供应也“不主張侵犯到农村关系中迄今为止的財产关系和經營关系”。在那里应当“通过适合于农业的措施和合作社的支持来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强度”。

稀排的那些字指出了上面作为社会化特殊的經濟目的的标志。

在事件的一般过程中工作强度和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通过竞争的压力得到的，这种竞争是企业家互相爭夺市場或銷

路而造成的。用以达到競爭目的的方法归根結底不外是节约人的劳动，这些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論述爭夺剩余价值的几章中已經描写过了，因为爭夺市場是爭夺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發生这种結果。凡在壟斷关系發展的地方（而这种壟斷是到处都存在着的），凡在商品供应超过需求的地方，企业家要求劳动强度的冲动也就相应地減低了，并且在一定情况下会消失了。其結果是物价高涨和广大人民处于困境，以致提高生产率或生产强度的問題成为高度的社会利益的主題。这种标志在許多地方被人們当作战争的副作用。

在德国，对战胜国的債務負担也使得节约劳动成为社会的利益。現在，这里因为商品缺乏企业还能获利，但是，实际上在規模和设备方面落后于生产發展的平均水平。由于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和生产工厂的不必要的分散，它們的繼續存在从国民經濟上說是浪费了劳动。为了反对这种情形，拟出了改組国民經濟的建議，給这种改組命名为計劃經濟，属于社会化的范畴。

計劃經濟的思想涉及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战争时期鉴于战时經濟的必要性、根据富有思想的大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和社会经济学家維夏特·封·穆倫多夫的建議和他們所拟定的計劃由官厅安排的。在卡特尔生产集团的大工业中，这些措施是在保留资本主义过剩經濟的条件下按照美国托拉斯的先例来实行的。应当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成立一切生产部門的企业家协会，并在各地方和各專区有机地成立分会，在領導机构中有任命或选举的代理人来代表群众、企业家、工人和职员。这些領導机构應該对工业的組織、編制和管理發生尽可能有社会經濟意义的广泛影响，它們的中央應該

从需要的迫切性和德国經濟的一般狀況的觀点出發，使輸出輸入服从起調整作用的法令。它們應該有權淘汰經濟中無益的中間环节，并对在生产組織和旨在尽量降低物价的工作方法方面的一切改良發生作用。它們應該用規定工資合同和补充法令的方法來創造使工作情況尽可能令人滿意的工作条件。

不仅资产阶级的理論家和关心者尖銳地反对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經濟部長魯道夫·威賽尔所拟定的成为一个包罗很广的体系的計劃，而且这个計劃也遭到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对。对他的指摘首先是說他保留了資本主义企业家，并且甚至于尽可能地在实践中加强他們的力量。說他阻撓了通常使用的原料如煤鐵等工业实行迫切需要的全部社会化，并很容易地培植了損害經濟生活的官僚主义的規定和干涉。

犯这种錯誤的可能性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在由各方面联合組成的領導机构中犯这种錯誤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已証明有害的法令也不難加以改变。同样也看不出，在民主組成和把經常的群众監督訂在計劃之內的情况下企业家协会为什么和如何还能加强資本主义企业家的权力。就是这个作为計劃基础的思想并不因指摘而被否定。这些同样也适用于那个說計劃經濟組織和生产的調整延迟了，甚至阻碍了煤鐵的全部社会化的指摘。凡是我們沒有計劃經濟協會或类似机构的地方都証明了社会化要与之作斗争的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

德国必須有一些这种类型的东西。德国国民經濟的世界經濟条件以及加在它的身上的財政負担使得它不可能長期保

留瘋狂競爭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是隨着廢除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的强制設施而出現的。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德国貨幣的贬值維持了国家的输出并对国家的生产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它和貨幣价值高的国家相反，几乎不知失业为何物。但是其他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施行附加稅和其他保护措施来抵制貨幣价值低的国家的竞争，并且这些措施越普遍化(例如在美国已經用立法行动来作为开端)，由于貨幣价值低而产生的利益就越少，而在筹备足值的支付手段来購買德国自己不生产的原料和支付它的外国赔款方面造成困难的缺点却仍然存在。进而采取徹底的措施以使其国民經濟更加經濟化就成为維持自己生存的信条，如果人們不願意使国民經濟听任由竞争而引起的資本主义战争的偶然性和殘酷性的摆弄，那末就應該着手施行那些在計劃經濟草案中所規定的，即使也許还不完全系統化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在還沒有得到發展的意義上被使用，但是它們却将實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因为无论如何它們意味着向着由社会来調整生产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和把工人提高到在經濟組織中可以參加决定的地位。它們可以有这样的伸縮性，以致在倡議有保留价值，就是說在可以起創造作用的地区的經濟中它們使个人倡議有广闊的活动余地和不妨碍适于全部社会化了的生产部門的全部社会化，而相反地予以便利。

此外，国家、各邦和市鎮的已經大大增長的和正在不斷增長的財政需要也迫使进行向公共經濟这个方向走的改革。在社会主义範圍內人們感兴趣的是，只要公家管理的經濟部門和營利目的相結合，便簡單地称为国家資本主义或市鎮資本主义。如果这种資本主义是事业唯一的目的或支配一切的目的，那末用这个名称也还合适。当在这些企业里公共利益

是主要的动机，并且当涉及在这些企业里面的工作人員时，社会要素就显现出来，而盈余則与此相反，只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节约才能获得，今天这种情形越来越多地發生，前面所說的名称也越来越失去根据。此后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变为公营的，这固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每次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这些应当而且也将會增加。

共和国的財政需要非常大，就是把各种旧的直接稅与消費稅和交通稅相混合也很难長久滿足这种需要。因为这种原因，并且因为实际价值如土地、工厂和商店等等的所有者由于貨幣貶值靠牺牲群众利益的办法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潤，所以要求直接由国家掌握实际价值的呼声响亮起来，社会民主党特別坚决地主張这一要求。共和国應該用通过票据保証国家在每年的收入中有一定份額的方法，也成为这些实际价值的所有者。实行一种措施使国家在一定前提下可以通过存放这种票据在国家銀行的办法来抵偿悬浮的債務或紙幣的發行，以便大大提高貨幣价值，这种措施同时也使共和国在企业的財政状况方面有更詳細的了解，这样就可以提高它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这就是各色各样的地主和資本家对这种要求大力地、可以說是絕望地反抗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者認為这种要求特別值得爭取实现的原因。因为它是必要的信条，人們可以公开地說，它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并且是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因为它在国民經濟整个范围内可以發生对社会有利的作用，而合法的营业并不因此受到限制。

社会主义思想的使用范围当然并不限于在特殊意义上的經濟問題以及与它們有关的所有权問題。它包括对提高物質福利，对获得最高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以及与这种文明相适应的法律形式有意义的全部問題。在这里也涉及革新的問

題，这些革新个别看来还不是社会主义，而通过革新所包含的精神以及这些革新和許多以同样精神来制定的改革的联系就将成为社会主义。从各级学校教育开始，直到有广大分支的社会政策、法律形成、社会衛生及文化政策等部门中，社会主义以实行改革为前提；資产阶级的政府和資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完全沒有或仅在特殊情况下接触到改革的問題。

現在只談談社会主义政策，1918年十一月革命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德国除了把劳动保护工作作了其他有意义的扩大，还宣布了工商业界最長的工作日为八小时。如果我們称這項改革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步，我們又可以引証馬克思的話。1920年2月4日公布的职工委员会法对这个名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十一月革命生动的气息还起作用的立法国民會議上制定的法律給了工人和职员在企业中的权利，这些权利人們在馬克思著作时期認為是不可能得到的。这个法律当然还是不完备的，并且它对于国民經濟收入所起的作用还不能完全一目了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并且在实践中也为由于受一定宣傳的影响在制定这个法律时曾經和它作过严重斗争的那部分工人所承認：它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再沒有其他部分象这部分一样为工人和职员开辟了从工厂附庸变为在社会法律意义上的股东或同伙的可能性。正是只有通过民主共和国的爭取它才能制定出来。这个共和国当然才不过是經濟上的社会解放的一个法律槓杆，还不是解放本身。但是在一個像德国工业这样先进的国家中，在一个有發展的以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組織得很坚强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中，这个槓杆只能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起作用。它不是根据一点就能适用于一切的公式，它不能在社会生活的整个范围内一下子实行，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

36年以前(1885年)在为尤萊斯·居斯特和保尔·拉法格所編的关于馬克思写的1880年創立的法国工人党最低綱領序言的說明所作的附录中，該文作者写道：

“人們應該去掉夢想一个完备的未來国家的習慣而要坚持这种認識，那就是直到为社会主义原則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門中都开辟了道路，需要一个長的發展时期。

有些人在脑子里时常憑空忽略了一定的过渡阶段，但是，实践更是經常使这些空想家的計劃落空。

模糊的梦想是一切具体思想的死敌。但是后者对于工人阶级正是必要的。沒有具体思想，就沒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沒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就沒有有計劃地对目的的認識和有目的的行动，这些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必需的。”

这些句子在比我当时想像的还要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合理的警告出現，并且还得到一些补充。我对社会經濟的認識还差得很多。由于在經濟生活中估計过高的現象，我認為西歐和中歐能够比实际發生的更接近社会主义的實現，而且估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比实际所采取的簡單得多。經驗教育了我們，这个距离是相当大的，道路也絕不是簡單的，根本不能簡單地說是一条。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因此就灰心喪气。請允許我这样說：如果我回顧一下当时的情形，并且把它和今天作一个比較，我才看出，在和人生比較起来还是很短的时间內已經發生了如何强大的进步。道路不是当时所表現的那样簡單，但是为了战胜它而工作的力量是在更完全不同的程度上大于当时。

一支来自各方面的比当年大20多倍的各种工人大軍以完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从事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作。每个人都为

整体所做的工作和要完成的事业比起来显得很渺小，并且今天的进步和过去的进步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当我们从一个能够统观全局的相当距离来衡量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清所实现的进步。但是，关于大飞跃的梦想使我们并没有损失任何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年青弱小的运动可能需要这种梦想，为的是在尚未感觉到社会成就的遥远路途上不致失去勇气。壮大的、已经成熟的、能起创造作用的运动不需要它。相反地它只能损害这种运动；因为对它们来说，错误的衡量将成为更大的不幸。常被误用的某个诗人的诗句对这种运动来说有充分的根据：

不受束缚的群英
枉自追求纯粹高度的完成；
谁想得到大的，就要倾注他的全力。

已经壮大起来的运动习惯于从它们的目的中暂时只考虑在发展阶段上对直接斗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对愿望的节制却包含着得到所希望的最可靠的保证。

（摘译自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